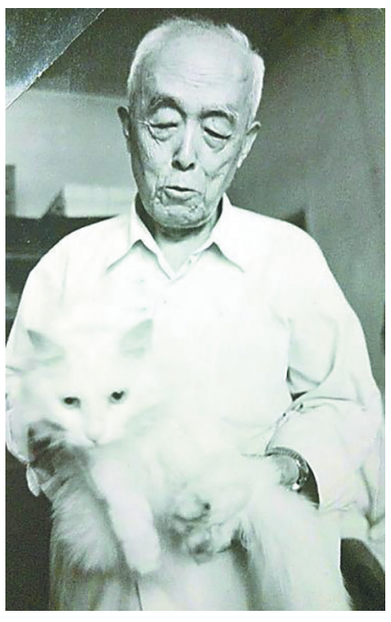
坐拥书城的季羡林



上

立秋那日，夏还非常热烈着，蝉鸣悠扬。道路蜿蜒的深处，是朗润园。竹林掩映之中，走下从凉台推门而出的季羡林先生。

在季先生指引下，走进他的家。过道里，满满的，是书橱。书橱上，满满的，是书。走进房间，是更多的书橱，以及书。大凡读书人都会艳羡这丰富的收藏的，而这感叹也使这位爱书长者高兴起来，他要引来访者，去参观他的书房和他的书。几乎所有的屋子，都井然有序地放满了书。其中有他留德十年带回的外文版图书，还有以相当便宜的价格购齐的大套《大藏经》……

季先生非常“奢侈”，因为他有三个书房。这是他三个读书、写作的地方。他喜欢采取“打一枪，换一个地方”的战术。在一张书桌上，写一个专题的文字。因为资料书及稿子等摊子铺得很大，所以，一旦写累，则空手转移到另一个书房，继续写作，或读书，只是换了主题。

其中一个书房，是用凉台改装的，四个简易木质书架，叠罗汉般地矗着。书们便有惊无险地拥挤在其中。访者隔着书桌，与季先生相向而坐。不仅书桌上有书，而且上、下、左、右，全是书。因此，说季先生坐拥书城，挥笔如剑，绝是不为过的。

在这里，特殊的书香和主人所营造的文化氛围，使无数访者流连忘返，灵魂在这里可以得到平和的宁静。

季先生每日凌晨四点即起身工作，那盏竹林后的灯光，应算是朗润园，乃至整个燕园最早的灯光吧。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了。清晨八时，他便像上班一样，走出家门，穿过未名湖，步行到大图书馆去看书。早两年，他是以骑车代步的，但近来，由于家人“严令禁止”，他便也“少数服从多数”，安步当车起来。季先生自称没有体育锻炼的爱好，“这就是锻炼！”他认真地说。在图书馆看两小时书后，他便循来路走回家中。

他最近的大动作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，撰写一部《糖史》，打算写四十万字的这部巨著，已写就十多万字了。

季先生爱猫，是出名的。两年前造访季府时，常见两只波斯大猫。此次去，季先生告知，其中一只竟于数月前被人窃走。剩下的那一只，叫“咪咪”，给工作之余的季先生，带来了些许欢乐。“咪咪”已五岁了，季先生风趣地说，已是“猫到中年”。

季先生虽然是功成名就的大学者，但他坐拥书城，却不甘心把朗润园当作世外桃源，他的忧国忧民之心依然如故，每每让年轻一些或更多的客人激动不已。

立秋那日，他与访者又谈起敏感而又不可回避的话题，季先生陈词慷慨，一席话刚落，窗外竟响起了雷声。

在季先生的家门口，与他握别。面前是一片细致的湖，正对着楼门，长着一片荷花。荷叶已绿到极处，而花，尚含蕊待放。

“那是我们种的。”季先生说。

“怎么种的？”访者问。

“撒下一把种子。”他做了个撒种的动作：“三年了，就长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”

此时，雨，已开始下了，寥寥落落地。

“我喜欢雨！”他说：“今年雨少呵。”

刹那间，从一个严谨严肃的大学者季羡林身上，看见了抒情的散文家季羡林的形象。他们是那么奇妙又和谐地统一在了一起。

他的那本散文选，厚厚重重，正在访者的行囊中，上面的作者签名，形拙而有妙趣。楼门的两边，均是季先生的家。一侧是卧室，放着二十四史，挂着齐白石的画，当然，还有他的书桌，他的纸和笔；另一侧是他用凉台改装的那个书房。

雨，打在竹林的叶子和窗玻璃上，声音先是碎碎的，继而连成一片。季先生穿着黑绸布衫，站在门洞，像一本厚重的书，默默观雨。

下

季羡林先生在1933年6月6日日记中写：“晚饭后，到朗润园一游，风景深幽。”彼时的他，22岁，在清华园已生活了两年多。因此，无法印证此是否是他与朗润园的第一次亲近。出清华西门，如果没有围墙，斜对角就是朗润园。1980年，季先生在散文集《朗润集》自序中说：“我在北京大学朗润园已经住了将近二十年，这是明清名园之一，水木明瑟，曲径通幽，绿树蓊郁，红荷映日，好像同《红楼梦》还有过一些什么关系。我很喜欢这个地方，也喜欢‘朗润’这个名字。”

季先生是朗润园中人，我在朗润园中拜访过他。印象最深的，自然是第一次，那是1991年6月19日。那天，我和他在他家一楼的阳台上合了影。看着这张距今已经27年的旧照片，有不胜讶异和惶恐之感，也让我顿时理解了“光阴似箭”“白驹过隙”这样的成语。这张照片于我，还有另一个意义，因为，摄影者是我1983年相识于学院路41号的老友唐师曾。大致计算了一下时间，正好是他从海湾战争归来，复又去新华社开罗分社任职前的期间。

那天去季先生家里，唐师曾至少用了两台相机，分别用了黑白和彩色两种胶卷。彩色照片我还保留了几张，地点是在季先生家的客厅。我和季先生相对坐在一张方桌前，至于聊了些什么，早已漫漶不清。但当年的照片保留了一些细节，现在看来颇有些意思的是屋内的环境：季先生身后，有一台14寸（不知是彩色抑或黑白）的电视机，罩着绛红色绒布套。墙上除挂着有风景的月历外，还有一个必须每天翻阅或撕开的日历。季家的日历，从照片可以看到，是向上翻阅并用夹子仔细夹起的。日历的底板，是一个美女……桌子上，有白瓷的茶壶，还有貌似盛放调味品的瓶子。这里，应该是季先生家的客厅兼餐厅。

还记得一个细节，我们正在聊着的时候，一只硕大的白猫忽然跳上了桌子，就在季先生站起安抚白猫的一霎，唐师曾用黑白胶卷那个相机抓拍到了那一个瞬间。后来，老唐把这张照片戏称为：猫争人权。

快离开的时候，我和季先生在客厅外的阳台上，以比较流行和正式的方式合了影。我应该也给老唐在同样地方按下了快门。通过这张1991年6月与季先生的合影可以看到，季先生住在一楼，阳台外是一片葱翠的小竹林。我腰间的BP传呼机看上去很抢眼、突兀，且有喜感。如今，这种俗称BP机的传呼机早已绝迹，但在当时，却是即时通讯的利器。我还记得我的号码是126—53630。老唐的呼机号码，我也记得：126—5566。

季先生出生于1911年8月6日，1993年他82岁整，按中国人算法也可算83岁。《坐拥书城的季羡林》一文写于1993年8月8日，从文章上看，我是8月7日去拜访的季先生。我找出了当年季先生所赠、我文中所写的“厚厚，重重”的那本书，我讲的“厚、重”自然有双重含义，物理上的厚重，也的确，那本书有556页。那是一本《季羡林散文集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12月初版，印数3550册。季先生在扉页留下了钢笔签名，时间正是1993年8月7日。这应该是我再一次去拜谒季先生。

季羡林先生的学问在当时的我来看，几乎是高山仰止，比如他说当时正在写的《糖史》，按今天的流行语来说，十分的“高、大、上”。我记得还问过他为什么要写《糖史》以及怎么写的问题。季先生的回答，可惜我早已记不清。如今，《糖史》业已出版，非常惭愧至今尚未一读。我想，我当年问的问题应该在那本书里会找到答案。

回想当年的季先生，马上就清晰浮现的，是他衣着非常朴素，似乎几次见他穿的不是衬衫就是蓝色的中山装。说话慢条斯理，有较重的山东口音。能让他兴奋和自豪的，似乎就是那一屋子、一屋子的书。第一次去，他还为书的无处摆放而烦恼；第二次去的时候，北大已经给他增配了一套房子，就在原先住房的对门，专门用以放书。对这一点，他是很感念的，因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，房子是多么稀缺的资源！

因为增配了一套房子，家中的布局也就有了变化。季先生带我在他家参观，记得他夫人当时有病坐在床上。再就是，他指着墙上的齐白石画给我们看，告诉我其购于五十年代的初期。我问价格，他的回答让我惊呆了。按今天看，画价便宜到令人咋舌。依稀记得，季先生告诉我当时是通过朋友去买的，买了两张，仿佛还买二赠一了……

2004年夏天，我第一次去德国，以马丁·路德大学所在的城市哈勒为原点，每天往不同方向的城镇坐火车随意转悠。某一天黄昏，从某个城市回哈勒，要在爱森纳赫转车，不知什么缘故，却坐上了去另一个方向的火车。当火车在终点停下，是个完全陌生的城市，我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哥廷根！我第一反应是，这是季羡林先生曾经留学生活过十年的城市啊……

□吴霖

鲁迅的西大往事

1907年时的西安城墙永宁门

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82周年纪念日。

据学者曹冷泉回忆，1936年，西安各界曾先后3次进行缅怀。尤以10月24日革命公园举行的追悼最为外界称道。

先生先学医，再从文，被称为“中国新文化运动旗手”，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，在经济发展，生活优渥的今天，越见可贵。

先生逝世十二年前，这位“黑而姓周的老头儿”“用汽车载，用船装，用骡车拉，用自动车装”，从北京奔赴西安，讲学逗留了二十多天，是西安城的一件盛事。

今将先生西安之旅回溯一二，以窥先生之风，一为纪念，一为重读先生心迹，呼唤后来人。

讲学

1924年西安讲学，是鲁迅先生人生中的唯一一次西北行。

此行源于刚重建的西北大学校长傅铜邀请，背后有当时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的资助。

先生当时在北大任教，同时为教育部佥事（处级公务员），虽未在最初邀请之列，但经好友推荐，亦一同前往。

此行酬劳颇丰，且众人均怀有一览古都名胜心愿，西安盛名，在当时亦是人人向往之。但路途颇为不顺，7月7日启程，14日抵达，8天7夜中，包括陕川到潼关的4天黄河水路。迎接鲁迅一行人的张辛南撰文回忆：上船后，“大风大雨整夜不息”，夜间乘船更是倒行十余里，幸好后来停住不至遇险。

同行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教授王桐龄回忆：“船顶甚低，仓甚窄”“卧则屈膝，坐则折腰，立则鞠躬，人人终日抱膝长吟”，加之不惯于在船上“出恭”，甚是煎熬。但鲁迅生于水乡绍兴，倒不觉“煎熬”，每日盘腿坐在船舱中央，兴致勃勃给大家讲故事……

正式讲学是7月21日。听众是陕西各县中学教师和教育干事。

虽然在开学式上，校长傅铜称赞众人：“诸君（学员）均踊跃前来，足征向学心切！”但在同行讲学的南开历史系教授蒋廷黻眼中，这些人：“年纪大，像人面狮身像似的坐在教室里，太没有礼貌，不是喧闹就是打盹，我简直弄不清楚，他们是否还知道有我这个人在”。

但鲁迅的课是受欢迎的。

先生所讲，乃是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，21日开始，29日结束，8天内11讲，共12小时。30日下午，虽又应邀前往讲武堂为陆军学生讲演一次，仍为小说史。

授课的讲义，后经西北大学整理，寄请鲁迅改定，印入《西北国立大学、陕西省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（二）》中，后又以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为题，附录于再版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。

西北大学教授邓益民创作写实水墨画《鲁迅在西大》

所得与所留

讲学之余的一些应酬，鲁迅是极为不屑的。

据说赴讲武堂为陆军学生讲演前，督军刘镇华曾托人示意鲁迅，在给陆军官兵讲演时换个题目。但被鲁迅拒绝，称自己只会讲小说史。刘碰了个软钉子，几乎要掀开“礼贤下士”的假面具。

许广平对此亦有过评述：“鲁迅对当时西安以及北方军阀黑暗，是很小心对待的，故对军士也只讲小说史。”

但对于西安这座城市，鲁迅显然是抱着很多兴趣的。

就在到达西安的当晚，兴致难减的鲁迅便携友人，“至附近街市散步。”尔后的日子里，这种“散步”让鲁迅在西安多处留下了踪迹。

少为人知的是，鲁迅对于古碑拓片有着浓厚的兴趣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旧历除夕也，夜独坐录碑，殊无换岁之感。”北京的琉璃厂，由此留下了不少关于他的故事。

如今北京鲁迅博物馆，保存的碑帖及汉画像藏品高达6000多件，可见其痴迷。

来了西安，南院门、碑林、大雁塔、曲江、荐福寺等，成为鲁迅最为喜爱的驻留之所。四处的造访，亦让西安城的不少人知道了这位“北京来的姓周的老头”。

《杨贵妃》

90年代国人渴望诺奖。坊间曾议论此前文学家中谁可获此殊荣。一为沈从文，一为老舍，再就为鲁迅。但末了，总要感叹，鲁迅缺一部长篇。

感叹的这部长篇，就是鲁迅打了三四年腹稿的《杨贵妃》。

鲁迅对唐代历史文化有深切认识和精到见解。以杨贵妃为题写一部长篇，乃是先生认为：“唐代的文化观念，可以做我们现代的参考，那时我们的祖先们，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，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，决不轻易的崇拜或轻易的唾弃。”

民国时期，救亡图强是社会各界主题。对民族未来的方向，从西方传来的各种思潮与当时国内的儒家各有主张。《杨贵妃》若成，当是先生人生的最重要作品之一。

故此，赴西安讲学，将自己置身李、杨风流十余年的空间，体味这座古城千年前的气息，亦是先生赴西安目的之一。先生游览之处，包括了大雁塔、曲江池、碑林及昭陵等地，亦曾计划赴马嵬驿，但未成行。

最终，先生放弃了《杨贵妃》写作，在与日本友人的书信中感叹：“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。”

其时的西安，是怎样一番模样？

1924年后两年，西安经历了历史上著名的“二虎守长安”。而围攻西安城的，正是接待鲁迅先生一行的刘镇华。

虽然邀国内饱学之士赴西安讲学，是开明之举，但这个起家河南的军阀，统治西安十年间，并未有什么好声名。后曾任广州大学教授的西安人郑伯奇说：当时西安乃至陕西的政治和社会各方面情况是十分恶劣的。

同行讲学的李济回忆，当时西安抽鸦片成风，不但自己抽，而且以此待客，客人拒绝，主人反会生气。一次他与蒋廷黻饭后散步，在一座古庙旁的戏台，竟见到“三对并躺在一块儿抽鸦片的叫花子”。

无论是什么样的西安，鲁迅终放弃了这部人生唯一长篇的写作。

而今，以“杨贵妃”为主题的剧，虽不若“武则天”层出不穷，但或为电影，或为现场实景演出，博人一时之乐，或传递一时文化表像。先生所思，遗忘久矣。

也许，先生当时应上白鹿原见见朱先生……

□高湘山

■往事

汉文帝诞生高陵的传说

近日，发现明代版《高陵县志》记载有：“奉正原在县南十里……旧传汉文帝诞于此原崇皇地，或曰诞于毗沙镇。”又发现县志为明代陕西的状元吕柟（枏），泾野先生所编。因为吕泾野为陕西整个明代两个状元中的一位。如此大学问家，焉能不信。

吕泾野先生为明代著名理学家、关学代表人物，当时学人尊称他为“海内硕士”“当代师表”，认为“在关中可继张横渠者，泾野一人”，吕泾野“乃家之孝子，乡之善人，国之忠臣，天下之先觉先民也”。

《高陵县志》还有多处记载与汉文帝及其母薄姬薄太后有关的史料。

第一是《高陵县志·祠庙志》：“崇皇寺：在县西南申村，唐初置，宋太宗敕赐名额。相传汉薄姬妊文帝而出宫至此柏下诞生文帝。”泾野先生还题寺额，“崇皇产异香，汉文诞此。”

第二是《高陵县志·邸宅陵墓》有：“汉降驾原邸：在县西南崇皇寺等地，旧传即文帝诞生处，薄后被吕后姤，出居于代州。时薄后方娠，至崇皇寺地，文帝诞生，今称降驾原。云或云，文帝自代来次，高陵毗沙镇，处四日，故传镇中东岳庙即帝诞宅也，原在八月十五日即帝诞辰。故异于诸东岳庙会也。又曰唐元宗两幸崇皇寺。云通志，后妃传高祖崩，诸御幸姬，吕后皆幽之，不得出宫，而薄姬以希见，故得出从子代。然皆无考。”

第三是《高陵县志·地理志》载：“县人相传，文帝生于毗沙镇，故以代来复次于此镇。镇通中渭桥路。”

第四是《高陵县志·地理志》载：“渭桥：在县西南，汉文帝从代来次高陵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。昌至渭桥，丞相以下皆迎，昌还报，代王驰至渭桥，群臣拜谒，太尉周勃请闻，跪上天子玺符。疑此桥当为中渭桥。故苏林注汉书，在长安北二里，而县人相传文帝生于毗沙镇，故从代来復次于此镇，镇通中渭桥。”

第五是《高陵县志·地理志》载：“饮马泉：在接蜀门外十五里，相传汉文帝饮马于此，焉今废湮。”

再加上高陵有明嘉靖三十二年（1553）立石的明代“重修崇皇寺记碑”，高陵状元吕柟（枏）撰文中有：“相传汉薄姬妊文帝而出宫，至此地柏下诞生文帝”的记载。

以上记载提供的信息让你明白，汉文帝不但诞生于高陵，而且他被迎奉为皇帝，从代国赴长安时，选择的路线是他的出生地高陵渭桥。

这一传说的原貌应该是汉文帝刘恒的母亲薄姬因孕而变丑，见不得人而被撵出宫。或说是她害怕儿子生后遭吕后迫害选择出宫躲避而流落高陵。因为汉高祖刘邦有八个儿子，除过吕后亲生的惠帝刘盈，其余七子在她掌权后害死四个。

在高陵有民间传说：说薄姬逃亡高陵后生活特别艰难，平时仅靠野菜度日，高陵有一种小蘑菇，是薄姬的主食。谁知，久食之竟然恢复了容貌，身体也健康了，因而顺利生下文帝。这小蘑菇被称为“姬菇”，传至今日。

民间有传说：刘恒赴长安，途经其出生地高陵渭桥时，有大臣迎上来附在他耳旁说话，刘恒拒绝道：“君子不听背耳之言。”表示了他的成熟智慧和正大光明。而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载：代王驰至渭桥，群臣拜谒称臣。代王下车拜。太尉勃进曰：“原请间言。”宋昌曰：“所言公，公言之。所言私，王者不受私。”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。代王谢曰：“至代邸而议之。”好一个“王者不受私”。同样表现了代王刘恒的正大光明。

后经三拒，刘恒方即天子位。并创下了“文景之治”的盛世。

在道德方面，汉文帝深具孝心。他也是《二十四孝》中“亲尝汤药”的主角。

“生母薄太后，帝奉养无怠。母长病，三年。”面对卧病三年不起的母亲，刘恒目不交睫，衣不解带，日夜守护，汤药非口亲尝弗进。世人皆叹，有诗颂曰：仁孝闻天下，巍巍冠百王。母后三载病，汤药必先尝。

文帝自己的孝行可以说是“爱敬尽于事亲，而德教加于百姓，刑于四海”。他把对亲人的孝、爱、敬，又延伸到对百姓的“爱亲者，不敢恶于人”“敬亲者，不敢慢于人”。《孝经·天子章》所说的，文帝刘恒尽到了“天子之孝”，这才是古人所言的：小孝孝于庭闱，大孝孝于天下，成为一个典范。

高陵，秦时即为京畿之地，秦孝公十二年置县，为我国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古县。高陵区名的“陵”，并非和乾陵、茂陵一样，因为有埋过什么皇上的陵墓而得名。查《高陵县志》方知，高陵之名以南部有奉正塬，俗称白蟒原，状若土山有关，所谓“大阜曰陵”。

高陵为汉文帝刘恒的诞生之地，彰显了高陵的文脉深厚。

□朱文杰

■钩沉